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
南北政府的关系 …… 熊克武（1）
1917年成都罗刘、戴刘之战 …… 邓锡侯　田颂尧（27）
四川讨贼军的兴起和失败 …… 吴克雄（37）
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 …… 金汉鼎（69）
护法期间唐继尧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其演变 …… 詹秉忠（100）
滇军第二次侵黔实录 …… 严池华（105）
《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续述 …… 仇　鳌（114）
赵恒惕上台的阴谋和血手 …… 姚大慈（129）
赵恒惕的省宪活动 …… 黄士衡（140）
陕西靖国军始末 …… 马凌甫（155）
阎相文的自杀和冯玉祥督陕 …… 刘　骥（173）
张绍曾事迹回忆 …… 张绍程（184）

质疑·补充·订正

几点质疑 …… 钟凛之（215）
对《刘湘死后川局波澜纪略》一文的更正 …… 张志和（216）
关于《旧桂系的兴灭》一文的几点意见 …… 罗翼群（216）

《重庆战时生产局》文中的补充…… 翁文灏(219)
对《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的订正…… 袁桓楚(219)
方先觉是投降日军的…… 滕文藻(219)
关于国际间谍雷鸣远和雷震远史实的几点补正
…… 天津宗教界编史委员会(220)
对《关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的更正
…… 陈铭枢(221)
关于王赓…… 陆小曼(222)
有关劳建白的更正…… 劳君展(224)
张敬尧被打死在北平六国饭店的经过…… 郑庭笈(225)
对《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的两点订正
…… 张宝武(226)
关于《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的订正
…… 周一志(227)
关于林森任“国府主席”的问题…… 陈铭枢 杨玉清(228)
关于《陈光甫与上海银行》的更正…… 丁裕长(229)
有关《邓铿之死》的订正
……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229)
两点更正…… 曹谷冰(230)
关于《张静江事迹片断》一文的订正…… 周一志(231)
三段小更正…… 陆自在(231)
关于国闻通讯社的补正…… 邓汉祥(232)

附注：

对《四川讨贼军的兴起和打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

辑》第三十四辑、第四十八辑

对《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第三十七辑

对《滇军第二次侵黔实录》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

对《张绍曾事迹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第四十八辑

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

熊克武

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一)自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至1913年癸丑讨袁失败为第一阶段，是为党内纷争开始的时期；(二)自1913年讨袁失败，至1918年国民党取得川省政权为第二阶段，是为党内内讧逐渐激化的时期；(三)自1918年党内展开尖锐斗争，至1920年熊克武辞川督职为第三阶段，是为党内内讧演变为战争的时期；(四)自1923年讨伐曹吴，至1924年国民党军队退出四川为第四阶段，是为党内重新合作的时期。现分别略述如下。

一　自1911年至1913年时期

(一) 前清同盟会时期的情况

要叙述民初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必先追述前清同盟会时期有关的一些情况，因为这是有前因后果的关系的。

1906年以后，东京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先后派川籍党人谢奉琦、熊克武、黄复生等为四川主盟人，回川吸收党员，策划革命，发动武装起义。

同盟会时代，我们是没有武力的，要武装起义只有运动清军反正；这项工作就由原在新军中工作的同志龙光、黄斌如、陈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刃等负责进行。四川会党的势力很大，散布的地方也广，巡防营和警察中有他们很多的弟兄，这是个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由帮会中的同志余英、曾省斋、廖云从等负责联络号召。其他如学校则由服务教育界的同志张培爵、黄复生、黄金鳌等负责，机关由服务劝业道的同志谢持负责，进行宣传联系。我和谢奉琦、余英、曾省斋等往来各地，联络同志，配合力量，负组织起义的责任。这种工作的分工本来是很自然的，但由于某一部分同志长期在一起工作，又因保密跟别一部分同志很少接触，就使得某一部分同志间，关系更为亲密些，而和别一部分同志的关系就生疏些，或者互不相识，这样在同志间的情感上无形中先有了亲疏之别。其次，前清说革命是造反，称革命党人为“土匪”，抓到了就要杀头，家属亲友也要连带坐罪。因此，党人只能在最可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中进行活动；而初期的同盟会组织既不够严密，个人的组织观念又薄弱，很自然地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个别联系。这些情况，对于以后党内的分歧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907 年江安、泸州、成都、叙府的起义相继失败，党人死难和被捕的很不少，由此在同志间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有一部分人由于历次起义损伤很大，主张稳健，认为要等待时机，不要轻易冒险；而大多数人则认为革命是难免要流血的，即使失败，也可以振奋人心，扩大影响，主张还是继续干下去。不久，谢持和几个朋友离开四川到陕西去了，据说他们在那里办实业，想搞点经济基础，作为退步，这就是后来所谓“实业团”的由来。同志们对起义的不同态度，对于以后在政治问题上见解的分歧，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党内的情形虽然如此，但在当时问题不大。因为大家都是富有爱国热情、为革命而参加党的；同时又有明显的共同奋斗目标，而环境非常艰险，正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时期，所以以后的广安、嘉定诸役，同志们都同样地踊跃参加，慷慨赴义。应该说，辛亥以前，党内是团结的，行动是一致的，因而对革命的进行并没有发

生什么消极的影响。

（二）成渝军政府合并问题

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四川党人纷起响应。同盟会谢持、杨庶堪、张培爵、朱之洪等在重庆成立蜀军政府，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成都清防军也发动兵变，设立大汉军政府，推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当南北酝酿议和，中山先生让大总统位于袁世凯，以求全国统一的时候，谢持等也策动合并成都、重庆两军政府，统一四川，共和党政客胡景伊（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是旧川军中的老资格）乘机附和促成，于是达成协议，合并为四川军政府，推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这是四川政局的演变。

我参加辛亥3月29日广州起义后，没有回川，就在上海同居正、宋教仁、陈英士等筹划武昌起义，曾到武昌去过一次，又转回上海。辛亥革命成功，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各省党人纷纷组织北伐军，旅沪川人也同时组织蜀军，参加北伐，推举我为总司令。旋南北议和成功，中山先生命我率部回川，后改编为川军第五师，我任师长。

关于南北合并，不少同志是不赞成的，我是其中之一。我回到重庆知道成渝业已合并，有许多同志是不同意的，所以我一到达重庆，成都方面就派朱之洪来重庆向我说明成渝合并的原因和经过情形。我对朱说："我刚从南京回来，外面的情形我是知道的。南北议和和让位给袁世凯，并非先生的本意，因为临时约法是管不住袁世凯的。于今成渝合并，所凭借的仍然是一纸协议书，将来怕要吃亏，难免有后悔的一天！"朱之洪急忙解释："文澜（胡景伊的别号）无他，可以同我们合作的。"可见他们是相信胡景伊的。

四川光复后，胡景伊由北京来到上海，同志们想要他担任北伐蜀军总司令，他推辞不干，匆匆回川，大家曾怀疑他别有所图。

后来事实证明，胡景伊是奉了袁世凯的使命，回省坐待时机，谋夺这天府之国的。1912 年 7 月，英国唆使藏军进犯川边乡城等地，袁世凯即令尹昌衡带兵出征，任命胡景伊（时任军团长）护理都督，而不让副都督张培爵代理，且以军民分治的名义，改派张培爵为民政长，并调京觐见。这就是他们阴谋的第一步。1913 年 2 月，四川省议会选举议长，国民党推杨庶堪，共和党推朱士黼，进步党推胡骏为候选人，选举结果，杨、朱各得同样的多数票，须进行重选。胡景伊即拉拢共和、进步两党合作，并派军警威胁议会，选出胡骏为议长，朱士黼为副议长。6 月，袁世凯正式发表胡景伊为四川都督。这个时候，国民党已被排挤于政治舞台之外，大权落于胡景伊之手，四川并入了袁世凯的势力范围。

当 1912 年冬张培爵、谢持去北京路过重庆时，我们都劝阻他们，我还说："北京、四川都是一样，不会相信我们的。我们都留在四川，只要同心协力，总可以为桑梓做点事情；有第五师在，他们不敢为难我们。"我又提醒他们："这次调京觐见，我看是胡文澜捣的鬼，最好是借故不去，我总觉得不放心啊！"谢持却很庄重地回答："大总统电调哪有不去之理！"可是张、谢到夔府后，谢忽然给我来个电报，要我出兵打胡景伊。我们当时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出四川大门就变了卦。随即回个电说讨胡师出无名，劝他们还是不去北京的好。他们还是走了。后来知道，谢持去北京是想活动倒胡的，我们不同意讨胡，没有配合他的倒胡计划，很不高兴，从此就恨了我。

谢持、张培爵北京之行的结果如何呢？袁世凯最初委了他们一个闲差事，不好离开，只得在北京住下来。到了第二年，国民党讨袁失败，袁世凯开始迫害国民党人，谢持逃往日本，张培爵迁住天津，开了一家织袜厂，以维持生活，袁世凯还是以乱党的罪名把他枪毙了。后来我问起谢持这件事，他只说："烈五（张培爵字）丢了都督不做，去北方打袜子谋生，还不能容他，袁世凯这个人真狠！"其他就不肯多谈了。

（三）癸丑讨袁之役

1913年(民国2年，癸丑)3月，袁世凯暗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4月非法大借外债，6月免江西、安徽、广东三省国民党都督职，中山先生号召讨袁。7月李烈钧首先在湖口起义，南京、安徽、广东、湖南、福建、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均告失败。国民党称之为癸丑讨袁之役，或第二次革命。

四川因交通不便，得到消息较迟，8月2日我们在重庆开会决定，通电宣告四川独立，并推我为四川讨袁军总司令，杨庶堪为民政长。但内部又发生了问题。杨庶堪、朱之洪、卢师谛、吕超、石青阳主张西上讨胡(川督胡景伊)，认为胡是袁世凯的忠实爪牙，讨胡即所以讨袁。很显然，他们是想报“成渝合并”失败之仇的。我和但懋辛则主张东下讨袁。我申述理由说：“第五师有九千人，兵强械好，有力量拿下宜昌、沙市，攻进湖北，与江西、安徽、南京会师北伐，这才是讨袁；而且讨袁成功，胡景伊也不打自倒了。”争论好久，为了合作讨袁，我们让步，作出名义讨袁实际讨胡的决定。

正在计划准备中，王琦(同盟会会员，现任成都市人委会参事)由北京来到重庆。他告诉我外面讨袁的形势后说：北京陆军部同乡知道讨袁决不能成事，胡景伊一定会借这个机会解决第五师，劝我辞职，由他们设法派人接替师长，以保全第五师实力，留作他日之用。我告诉他：讨胡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北京同乡爱护五师，给他们打个电报，和缓一下内外夹击的局势，是可以考虑的，但必须和同志们商量，并要杨庶堪起草电稿，以免内部发生误会。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一部分同志要捉拿“北方说客”王琦，并且说“如果师长包庇王某，连师长也软禁起来”。我听到这些话，当即召集大家开会，说明事情经过，征求大家意见，讨论结果，还是继续讨胡。

对于讨胡的作战计划也有争论，杨等提出个书面意见，军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署和各路司令人选都拟定好了，多半是他们的人，要我点头同意。我看这个计划是不行的，向他们解说："人选没有什么。不过敌我的力量为四与一之比（胡景伊有第一、二、三、四共四个师），我们不能分散兵力，应该集中力量，直捣成都，先破其老巢，擒贼擒王，速战速决，才有胜利的把握。"杨等认为孤军深入，太冒险，不赞成。最后决定，分兵北路、东路和水道三路，一面消灭在泸州的敌军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师，一面攻取成都。终因兵力分散，持久不决，受敌人内外夹攻，致遭失败。

9月，袁世凯下令滇、黔、陕、甘、鄂五省联合旧川军，会"剿"四川讨袁军，黔军已攻至重庆对河，人心皇皇。这时候，陈泽霈、向传义来到重庆，向我说：外面大势已去，现在又兵临城下，前线的部队回援不及，不必再打了；同时重庆绅商也向我请求不要据城作战，以免糜烂市面。我说我不能丢掉部队不管，陈、向表示愿意代我办理善后，我只好命令师部军需处会同市商会将全部公款、军需、军实点交陈、向，并规定发给官兵回家路费。一切安排妥当，我才偕余际唐离省去沪。临别时，王子骞（现任四川文史馆馆员）知道我带的钱不够，解下金表链子相赠，我至今没有忘记他对我的热情。

我们这最后一支的讨袁孤军，在六省的强大兵力围攻下，当然是失败了。而这次讨袁，四川党人的牺牲真是太大太惨。战场上死伤的将士不计外，全省各县被捕被杀的国民党员约有三百余人，且多被抄没家产。袁世凯还认为不够，除所谓"首逆"熊克武、杨庶堪"早经宣布罪状"通缉在案外，又开列在逃的军队、议会、机关、学校、报社的党员名单一百零八人，通令全国各省，"严行查拿，勿使漏网"。真是一次极其野蛮无耻的血腥镇压啊！然而也一方面说明了袁世凯和四川军阀是如何地仇恨革命党人，而四川国民党员又是如何英勇地反抗他们的敌人——北洋军阀；另一方面，党内同志间虽然有些意见，但为忠实奉行中山先生的讨袁使命，发扬了"同舟共济"的精神，这些都是难能而可贵的。

二　自 1913 年至 1918 年时期

（一）讨袁失败以后

讨袁失败，我和谢持、杨庶堪等先后逃亡到东京。我谒见中山先生汇报四川讨袁的经过，先生慰勉有加。我又报告："四川还来了几位同志，请先生约见他们，予以鼓励"，先生欣然同意了。我回去转告大家，都很高兴，独谢持表示："我不上伟人的衙门！"我劝他："还没有去怎么知道是伟人衙门呢？先去看看嘛，如果真是伟人衙门，下次不再去好了。"谢没有再说什么，我就陪他们会见了先生；不久先生任谢、杨为秘书。

此后，有人告诉我，谢、杨在东京常约四川同志开会，也不通知我参加，又到处攻击我。我想彼此是多年的同志朋友，过去虽然有些芥蒂，总可以当面说开的。但当我屡次找他们解释时，他们总是避而不谈，而打击我仍旧不遗余力。谢、杨攻击我的几个问题，假使不怀成见的话，都是很容易弄清楚的。第一，谢、杨把四川讨袁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我一个人身人。不错，我是四川讨袁军的总司令，应该负失败的责任，但计划是共同商量决定的，而且是采纳他们的意见，已如上述。其次，各省讨袁军已先后失败，在强大敌人四面围攻的形势下，我们这支孤军还打了一个多月，可算是尽了人事的最大努力。这些事实，他们都是知道的。第二，他们宣传我带来了十余万元现款，不肯拿出来接济同志。首先关于第五师薪饷的处理经过上面已经谈过了，事实如何，不难向重庆商会和陈泽霈、向传义调查即可明白。还有胡景伊（川督）是时时想搞掉第五师的，发给五师的军饷是限制很严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自五师建立到讨袁失败，为时不过一年多一点，在这种困难情形下，维持已感不易，何能节余十多万元现款？再说，当时讨袁用兵之际，自筹军饷，因现金缺乏，不得已而发行部分军用票，即使五师还有存余，这种军用票能带到外面使用吗？这些

都是极简单明了的道理。说到我个人，上面也提到，还是王子骞送我一条金表链作路费，其他更可想而知了。第三，我对中山先生是以革命领袖崇拜他，信仰他；对黄兴则是以领导者和朋友看待他，敬重他（我跟黄兴参加过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当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时，因种种关系外传有孙派与黄派之说，我曾再三呼吁："孙、黄二公，只能合，不能分；合起来力量还嫌不够，一分就更无办法了。"又许多人因反对入党打手模，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我却加盟了。黄兴决定去美国，各省同志举行欢送宴会，我也曾出席，还在会上发言："希望克强先生早日恢复健康，回到东京，协同总理领导我们革命。"想不到，在别人说我是"孙派"的同时，谢、杨却把我打入了"黄派"。还有一件事，也是由小可以见大的。癸丑讨袁之役，袁世凯指熊、杨为"首犯"，胡景伊称为"熊、杨之乱"，四川人称为"熊、杨之变"。杨庶堪屡次表示不满地说："孙、黄可以成个名词，熊、杨不能成个名词，要么只能说是杨、熊。"后来，林虎、龚振鹏邀我同游南洋，我就离开了日本，谢、杨又给我戴上"南洋派"的帽子。其实在南洋的同志并没有作什么政治活动。

1915年，中山先生策划各省讨袁，由于谢、杨的推荐，发表卢师谛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吕超为川南区司令，石青阳为川东区司令，排挤我和我的朋友。从此，在外人看来，四川国民党形成了以熊、但（懋辛）和以谢、杨为首的两个对立的势力（外称"九人团"和"实业团"）。有同志警告我：以上种种都是实业团有计划的行动，首脑人物就是他们称为有"宰相才"的谢持，目的就是要在四川创立一个独揽大权的局面。我认为一班朋友的道义结合是可以的，但把它当作攻击人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不对的。我对于四川党内的派系，始终采取这样的态度，且以此勉诫自己。

在我以后回川的几年中，同中山先生很少有信使往还，及报告川省和个人的情况，先生自难了解实际的情形。而谢持、杨庶堪长期随侍先生左右，获得先生的信任，成为党内和政府的重要

人物，对于四川问题的处理，自然先生采纳他们二人的意见。关于我个人，谢、杨随时有说话的机会，久而久之，先生亦难免对我有所疑虑和隔阂，这也是情理之常。但最使我感奋的，先生一旦明了事实真相，即毅然改变他对四川问题的作法和对我的态度。所以，无论先生怎样，我决不肯稍违追随先生革命的初衷，因为我相信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这待下面……分述。不过谢持得到先生的信任和重用，应该仰体先生大公无私的精神，竭尽忠贞，以赞助革命的事业；而谢持却念念不忘四川，一有机会，就利有职权，假公济私，图谋实现其把持四川政权的野心。这对于制造四川党内的纠纷，以至同志间兵戎相见，谢持是不能辞其责的。具体事实也待下面分别列举了。

（二）护国之役

1915 年(民国 4 年)5 月，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亡国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帝制的同意；8 月北京出现“筹安会”，准备袁世凯袍笏登台做皇帝。10 月，中山先生派员分赴上海、山东、广东、陕西、四川、江西等省活动起义，并发表讨袁宣言和檄文。12 月 25 日，云南首先发难，通电各省一致声讨洪宪帝制；并推蔡锷为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广东；各省纷起响应。1916 年 6 月 6 日，这个窃国大盗气愤而死，副总统黎元洪代大总统，接受中山先生及护国军之要求，恢复民元约法，复开民二国会，护国之役遂告结束。

当中山先生发出讨袁宣言和檄文后，流亡南洋的党人纷纷回国，李烈钧、方声涛、余际唐、但懋辛和我从新加坡先后到香港，转道云南，策划讨袁。在港遇见卢师谛、张煦等十余人，奉中山先生之命由日回川发动起义，因缺乏旅费，滞留不得动身，我就代借路费，同伴往昆明回川。本来国民党人原拟推李烈钧为护国军总司令，蔡锷到后，以蔡与滇军将领的关系较李为深，就商推他们二人分任第一、二军总司令。

我奉派为四川招讨军司令，协同第一军的滇军第一梯团对北军和附逆的旧川军作战半年，至1916年7月始占领成都，平定川局。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因病赴日就医逝世后，改任滇军总司令罗佩金为督军，黔军总司令戴戡为省长，兼会办军务。川军整编为五个师：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旧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旧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旧川军)、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国民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国民党)兼重庆镇守使。

在这次讨袁战争中，四川同志间虽然也发生了一些小问题，但基本上是共同行动的。各地党人如颜德基、石青阳、童毅公、范毅、杨维等，不分派系，积极地投入了反袁战争，对护国军的取得胜利，是起了大小不同的作用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四川同志认真执行了中山先生的“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致党员电)的指示；另一方面表现了四川同志一致反抗北政府的态度。

但这不等于说四川党内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都不许可这样乱搞的。第一，当我组织四川招讨军时，为求党内团结，消灭过去的裂痕，特委卢师谛为参谋长，周官和(无派系)为第一支队长，吕超任第二支队长，而但懋辛、余际唐等列于参议的次要地位。又第五师建立时，我派向传义为第十七团团长，吕超为第十八团团长，这样的安排，同志们自然无话可说。不过谢持却打电报向卢师谛、吕超查问：为什么重要职务都归熊某一人？可见他还是不满意的。又卢师谛活动第四师师长不成功，也怪我帮忙不力。第二，当年的四川已成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就政治而言，由北方的专制统治，转变为滇、黔人的共治，四川人并没有掌握自己的省政。就党派而言，由帝制派(陈宧)的独霸，转变为国民党(罗佩金)与进步党(戴戡)的分权，但罗系云南人，后台老板为唐继尧。就军事而言，赶走了北洋军，进来了滇、黔军，而川军五个师中，与北洋军阀有关系的旧川军占三个师，国民党军队仅两个师，力量为三与二之比。在这种形势下，四川国民党

人站得住就不错了，还有何求？省中同志们都了解这种情况，也就相安无事。但在南北势力、主客军、新旧川军杂处并立的环境中，由于权力和利害的冲突，就构成了南北间、主客间、川军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交织着纵横联合和相互斗争，自然要影响到四川党内的分化和内讧。从此内内外外就多事了，而老百姓苦矣！

（三）护法之役

自1916年7月结束护国战争，至1917年9月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以前的一年多中，由于北政府内部的矛盾，和旧川军与滇、黔军争霸的冲突，战事迭起，我们夹在中间，处境是艰难的，应付是困难的。

首先是刘存厚（旧川军第二师长）用武力赶走了罗佩金（川督），北政府任命戴戡为督军兼省长，四川成为进步党和黔军独占的局面。继之，刘存厚又击败戴戡，北政府任命周道刚（旧川军第一师长）为督军，省政权又属于旧川军。而段祺瑞（北政府内阁总理）阴谋直接控制四川，派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兼四川查办使，带北军入川，以查办"刘、罗"、"刘、戴"之争为名，实行取周而代之。周道刚本来是欢迎吴光新来的，他想利用吴的权力，驱逐滇、黔军，并压制我，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后得悉吴带有数旅之众的北军，知道来意不善，恐慌起来，又不敢公开反对，便借反客军的名义，把刘存厚和滇、黔军之战，扩大为川、滇、黔的战争，以拒阻吴的入川。周道刚也曾要我参加，我不客气地说："第五师还戴着红边帽（护国军军帽），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周自然恨我，声言赶走滇、黔军后，即消灭第五师；并电北京政府调我为川边镇守使，派钟体道（旧川军第三师长）接充重庆镇守使，又电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拒不交代，使我两边落空。

吴光新既有所为而来，而川、滇、黔军的互斗，两败俱伤，正好坐收渔人之利，就带着大军进驻重庆，坐待时机。周道刚一计

不成，转而请求吴光新派兵助战，我却主张“先查后办”，与之对抗，用意是在阻吴帮助周，一方面减轻滇、黔军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我担心如果吴卷入战争漩涡，北军势必源源而来，战争的扩大，地方的糜烂，将不堪设想。但在吴光新看来，我的主张正合他“坐山观虎斗”的私意，就振振有词地拒绝了周的要求。周道刚又进而向吴光新献策，说熊某始终是北方的后患，应该合力铲除他。而吴另有他的想法，即利用熊、周的矛盾，互相牵制，便于从中摆布，同时也不肯为周打仗，牺牲自己的实力；因此不采纳周的献计，周是着着失败了。总之，在相互利用、各有打算的情势下，我一个人留在重庆，静以待变。当时的第五师，一部分驻川东沿江一带，另一部分已协助滇、黔军共同作战，城内只留下少数的卫队。一天，吴光新的副官长马麟暗示我：“身边没有兵是不行的，调点队伍回来吧。”传送这个消息，是否出自马麟的好意或吴光新的授意，不得而知，但我警惕起来了，即调两连兵进城，加强自卫。

战事急转直下，滇黔军迫临重庆，吴光新的靠山段内阁在这时候倒台，他就带着北军出川，周道刚也跟着跑了。第五师沿途袭击北军，北军损失惨重，这是五师给北洋军阀的一次打击。

1917 年，北京政府毁弃约法，解散国会。9 月国会非常会议开会于广州，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组织军政府，号召各省护法，准备出师北伐，是为护法之役。

川、滇、黔军驱走北方的吴光新军和川督周道刚占领重庆后，北政府又任命被查办的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张澜为省长。川、滇、黔各军将领响应护法政府号召，会议推唐继尧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刘显世为副司令，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各军总司令。时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在重庆，转来孙大元帅讨伐刘存厚电令，1918 年 1 月川、滇、黔各军分道进攻成都，3 月刘存厚败退陕南。4 月孙大元帅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省长，这是四川国民

党第一次掌握全省政权。

在这次讨刘的战役中，省内同志可称是合作的，进行是顺利的，但谢持却做了两件影响内部团结、令人遗憾的事。一件事是：广东护法政府成立后，即发表黄复生、卢师谛为川军正副总司令，石青阳为川东招抚使。直待中山先生得悉我被川、滇、黔各军推举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才予加委；并在致章太炎电中慰勉有加："克武兄兵力既厚，又得人心，洵吾党难得之士，望执事励其破除顾虑，提兵进取，安国乃所以保川也。"另一件是：第五师团长吕超，奉派为讨刘北路军纵队司令，吕因指挥不灵，电请派但懋辛为北路军司令，吕先进成都，即电广东报捷，护法政府任吕超为四川督军，各方面人士均以为异，吕也表示不知怎么来的。吕当电谢持，请转呈辞督军职，并望谢对军政大事，采取谨慎态度，以免影响革命政府威信。后吴玉章到广州说明情况，中山先生又改任我为督军，杨庶堪为省长。问题是解决了，同志们都敬佩中山先生的英明无私，可是谢持的如此行为，不免使彼此畛域之见加深了。这对以后党内斗争的激化，也是个重要的因素。

三　自1918年至1920年时期

四川国民党于1918年4月建立了自己的省政府，应该是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大好机会。而当时外面的形势如何呢？首先，中山先生被陆荣廷、唐继尧所迫，辞去大元帅职务，代之以岑春煊为首的七政务总裁。从此革命的军政府，蜕化为军阀官僚包办的军政府；四川国民党就失去了依靠的政治领导的中心。其次，唐继尧乘机积极布置，企图实现他筹谋已久的兼并四川的野心，四川有被人宰割的危险。内部形势又如何呢？党内的权利冲突，纷争无已，斗争日烈；而旧川军坐大待变，蠢然思动；刘存厚盘踞川边伺机而入。表面看来似乎是好转的川局，实际正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险恶环境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